

从信任视角看“浙江村”研究

刘若蒙

书目：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张鹞：《城市里的陌生人》

几乎所有读过项飙和张鹞的浙江村研究的读者都会抱有一个疑问：中国流动人口的“新社会空间”是否无法形成？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或者用西方的视角所言的“市民社会”，在中国是否面临着水土不服的情况？特别是中国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打破中国“正规”秩序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能得出一些超出地方性知识之外的结论与意义。而我读完这两本书后希望从信任的视角来对这种“非正规化”的共同体难以形成进行一定的解读。但还有一点需要澄清，使用“信任”此一视角并非此视角足够新奇有趣，能带来与众不同的解读，实际上，无论是项飙还是张鹞，都在研究中对信任问题进行过论述。使用此视角纯是因为笔者才疏学浅，使用一个看问题的方式，来让细节丰富，阐释多样的浙江村研究拥有叙事简化的可能。

一

移民是一个无论中西俱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中的主体大多是拥有不同身份的移民。何炳棣先生在其《中国会馆史论》中论述了一支特殊的“移民”是如何通过科举进入城市，并以怎样的组织方式去适应一个陌生的城市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便是“会馆”。会馆大致被分为三种类型：京城的会馆、工商重镇的会馆和小城镇的会馆。但三种类型的会馆都可以透视出城镇移民对同乡团体的依赖，以及在这种形式下的互助。在陌生的地带，同乡组织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存策略，这种远远超出其他地方的“籍贯”或者说“乡土”观念，被何炳棣先生归因于儒家的“孝”思想、行政法律、科举制度以及方言等。总之，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息息相关的。

而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在首都北京也出现了一个通过“同乡关系”作为纽带，联系发展壮大的一個团体，也就是北京的“浙江村”。项飙对浙江村的描述是：

“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多时曾达到近十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

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项飙在后来写成的序言中认为自己研究浙江村是因为它是“纠结中国”的一部分。微观上，这是因为个人对于改革遇到的不合理怪象的切身体验。从宏观上来说，他试图通过这样一项研究去给精英主义、自上而下设计的、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提供一个“非正规”的视角。

从我的阅读体验和研究本身来说，项飙是做到了。他正如他所倡导的“要从日常行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方法和叙述模式”那样为读者呈上了一份详实的记录。从“周家一日”分析浙江村生产家庭的一日轨迹，到“1995：波折与回潮”，这六章从一种“中介化”叙事的角度展现了浙江村整体的发展历史与脉络，以及个人的生命叙事。这为我们理解对浙江村提出的种种抽象化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首先，初读《跨越边界的社区》，会觉得涉及理论比较少，整个研究的主体部分缺少系统的理论框架的指引，整个研究如纪录片式将镜头对准浙江村中的人物。这是因为他要做的不是和西方的理论对话，也不是单纯在西方的理论模型下“套”中国的经验，而是一种信念感驱动下的学术研究。这点项飙老师曾经写文章讨论过

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2000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正式立项，以争取资金、争取认可（体现为学校排名、领导人赞扬、学者个人的职称知名度等）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化操作。知青时代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国家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倒逼”政府改革。后知青时代，研究操作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学术又是作为行政管治的对象而存在的；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以强化政府管治效果为主要目的、以封闭的“智库”咨询、命题作文为主要方式的，对政府的思路罕有震撼性的影响。¹

换句话说，读这本书的另一个深刻体验是，当时的学者往往认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带有很强的意愿参与到改革方案的设计中。这是“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而之后的学者

¹ 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05）

更像一个自成体系的专家系统，只为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提供智识上的帮助。正如作者在书中记录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记载的诸多细节，显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那么，为什么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我当初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期望，今天又该如何理解这个期望的落空？”

书中主要讨论了几点。第一点是使用“社会建构”观察到的浙江村的关系网络。使用“社会建构”，是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社会结构”区分开。项飙更注重“人”与整个社会实在的互动，而非费孝通当初的总体社会性事实的记录。项飙认为总体性社会事实总是面临着被本质化的困境，人们因此面临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我认为从社会实在的“总体面目”的观察到的“社会建构”对人日常行为的观察这一转变，和过往的“断言式”研究写作到如今的“描述性转向”也是分不开的。回到浙江村的关系网络，从整个群体来看，这个关系网络是“跨越边界”的——不仅和外部经济体系联结，而且积极改变外部的经济格局，形成一个覆盖全国乃至辐射全国的“流动经营网络”。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促进了内部网络的发展，而内部网络的发展又使人们的流动多少独立于体制的制约，成为一个自为发展的过程。²这个从高度统一的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群体，让项飙看到“正规化”以外的新的“非正规化”的活力。

其二便是“人”的关系。“关系”在本书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无论是早期描述浙江村的史前史，讲到“松紧两条链”，还是后期讲到浙江村人进入城市的正规商业系统，通过“关系的艺术”与正规体制互动。如何理解“关系”成为理解浙江村的发展与社会结构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重要关节。

项飙对于此的总结是“关系丛”。在最初，早期浙江村的发展是受到亲友关系这样的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驱动的，但在浙江村的发展扩大和个人生意的扩大的过程中，亲友圈和生意圈开始分离。在这个分离过程中也促使产生“核心系”。核心系是人们在生活中“交往频率最高，也最为重要的关系”³项飙的理论对后来浙江村的很多发展都颇具解释力。首先，靠亲友圈和生意圈的重叠来经营，导致谁也无法垄断利润，利润趋于平均化。人们就倾向于“扩散流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是“至上而下”流动而非其他。扩散流动形成的全国流动经营网络又反过来使内部的经营网络效率大大提高。其次，这使浙江村内部的企业难以形成，交易中心也很少产生。由于大户在集中商品的时候也集中了商品所带来的风险，而单个大户缺少控制外部市场的能力，让这一经营模式难以成为稳定的安排。同时，在社区内

² 参见《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第五章：

³ 参见《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第十一章

部，重叠的关系仅仅是经营关系，而不靠大人物或者精英来组织生活。在不同地方所形成的“系”里，尽管观念不同，但行动上却彼此配合。而对外交往的权力也完全没有被精英垄断，小人物的对外交往也能够说明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社区。

在上面的对“关系丛”讨论的基础上，项飙提出了信任的作用。他在书中问的问题是：那么是系内部的什么特征，使“浙江村”能迅速扩展并充满活力呢？

他否定了“信任能天然导致秩序的行动”这样的观点。他没有将浙江村中所形成的关系看成单线条，而将其看成有“锁住”能力的关系。他说：

信任和关系甚至不能分隔来看。信任就是一种关系。

从这个语境出发，他认为，既然信任是一种能“锁住”的关系，那锁住的表现是什么呢？是监督、制约，而关系越近，我更能察觉问题，那么“锁住”的能力就越强。另外，中国人对人的理解往往结合其背景，也就是其背后复杂的关系。在“锁住”方面也有影响。

至此，项飙对于关系丛的解读基本结束了。他总结道：

“关系丛”的意识让人们以多元联系为基础，再“外推”而建立共同感。

项飙对于浙江村中的关系分析不可谓不精彩，在读完前期的民族志故事之后又有这么深刻地对其研究问题的回应实在是让人叹服。信任与关系都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韦伯、涂尔干以及后来的齐美尔、卢曼、吉登斯都对信任问题有过比较综合的论述。吉登斯对于信任问题的探讨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性的思考背景下的，而现代性又建立在脱域的背景下。吉登斯对于脱域的定义是：“社会关系从地方背景的互动中‘脱离出来’以及人们在无限的时空跨度中重构社会关系的过程。”⁴我们可以看见，信任问题的探讨被放在社会实践脱离时空关系的背景中（其他的还有制度、全球化、亲密关系等）。而中国的80年代也是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⁵，研究信任是非常必要的。

翟学伟的研究致力于从时空性中找到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原点”。翟学伟发现：在血缘和地缘的背后是中国人的时空构念。这里的时空含义即表现为：相同地理位置中的持久性交往是中国人结成关系的首要原则，另外一项重要性就是时间，无论是事实的持久还是认定的持久，此要素给中国人的关系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和关键的。⁶翟学伟认为中国人的关系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三点：一是持久并缺乏选择性，二是受儒家伦理与社会制度规约下形成的“互动的等级和类别化”，三是对同一地区、群体或组织的认同，即“空间的同一化”。而这缺乏

⁴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⁵ 虽然两个现代的含义不同

⁶ 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

选择的关系也让关系中多了一些感情性,促使信任的产生。同时存在一种关系的义务性界定。这种义务性界定是一种无选择的服务和服从,如孝顺、忠诚等。我认为这对理解浙江村的“信任”也同样有益,也可作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证。

二

张鹞的这本书叫做《城市里的陌生人》,其实从学术的某些侧面上来说显得矛盾。在社会学中,对城市的定义与区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人际关系上,马克思·韦伯的为城市定义道: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即城市——笔者注)将意味着:一个地方,即一个不是房子相互邻接的居民点,它是广泛的相互关联的定居点,缺乏邻里团体特有的那种居民个人间的相互认识。照此看法,只有大的地方才是城市,地方要多大,才开始有这个特征,这取决于一般的文化条件。

这个定义的核心是,成员缺乏相互认识。也就是说,农村是熟人的社会,农村人生活在熟人中;城市是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城市人生活在陌生与匿名中。那既然如此,张鹞老师又为何使用“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个标题来涵盖她的浙江村研究呢?

她在书的引论中写道:

虽然城市急需外地人所提供的廉价劳动与服务,但对城市管理者和居民而言,流动人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眼中,外来人口将会消耗本就紧缺的各种资源,还会导致犯罪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上升。既有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基础之上。对这一体系而言,如此数量庞大、难以管理的流动人口的存在无疑会带来诸多问题。此外,近期形成的一些流动聚居区令高层领导和城市官员更加不安,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正在形成“政治真空”并将成为滋生社会丑恶现象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温床。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来管理流动人口,以应对其大规模迁移而形成的以社区为基础的(communitary-based)民间权力

在张鹞的书写中,流动人口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主体,更是被权力所凝视的对象。这同样也是作者的一种知识分子关怀,项飙通过非正规的叙事质疑了精英主义从上而下的改革方案,而张鹞的目的从一开始也很清楚,她质疑的是80年代“晚期社会主义”中简单的“市场进攻,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借用福柯与列斐伏尔的理论分析权力与其在空间中的再生产,反对了简单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读这本书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政府,中央到基层,在政治

稳定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这显示出哪怕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也并非单一面向，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国家-社会关系才是有意义的。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95年的浙江村拆除运动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同态度：从上层机关来说，他们并不从流动人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中获益，对于他们来说，保持政治稳定更为重要；而对基层官员来说，他们是直接与浙江村人互动的群体，与他们存在“关系”，并且也从他们的经济活动中直接受益，更倾向于保留浙江村。这样的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差异，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也有体现，基层往往是在与民众实际互动的权力，而高层权力往往与地方的关系网络保持着疏离，却又因此具有更好的形象。这一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公众心中的“信任”不同，被李连江老师抽象为“差序政府信任”。

三

相比项飙老师，张鹞老师更多地是从国家-社会关系，或者空间、权力的角度来看权力的运行、政治控制，以及“社会治理术”的运用。似乎对信任的论述比较少。

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探讨，第一，即流动人口为何被“不信任”？信任是一种复杂性的简化机制，而不信任是一种更为决断的简化机制⁷。信任比不信任更省精力，更流行，但为何会不信任呢？郑也夫认为信任和不信任是链接的，在关键点上剪除才被替代为不信任。这个关键点或许是张鹞提出来的回答：文化逻辑。

那些背井离乡的或边缘化的群体的“罪犯化”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实际上，那些跨越空间和社会边界的流浪群体往往因其“位置不当”而容易被视为危险和社会污染的源头。因此，脱离原属地经常被等同于社会意义上的失序和无法控制的破坏性力量。在很多文化背景中，学者们都曾证明存在这种类似的将边缘或移位群体——难民、移民、黑人、同性恋者和无家可归的穷人——罪犯化、病态化的过程。

这种“位置不当”如同孔飞力所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文中翟学伟提到，中国人的关系是一种缺乏选择的关系，是一种捆绑式的关系，而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重组，带来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恐慌，这是一种文化逻辑。同时，张鹞也提到，在国家-社会关系这个背景下，上层权力由于对基层社区自治权力的恐惧有意抑制民间权力的发展，变相地滋长了犯罪者的态势。

⁷ 卢曼：《信任：复杂性简化的机制》

⁸ 郑也夫：《信任论》

同样地，正如项飙前文所提到的“新社会空间”一样，张鹞也提到在这个由计划经济转向混合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空间关系发生了重构。非正规的流动人口经济和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另类生活方式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空间，一种可以滋养商业创新与私人社区生活的社会空间。而大院长主或者说流动人口中的大人物的权力基础正好就是对现有空间关系的重构，这也正是国家所担忧的部分，因为它会挑战现有秩序。

而浙江村的结局似乎是京南的大院被现有行政权力强力摧毁，浙江村人民后来回归，但好像也无法重现往日集体行动的光景。而张鹞老师整本书都是一种克制、学术的语言来进行讲述，讲到金瓯大院（浙江村中最大的大院）被拆除也使用了比较带有感情的文字：

在这一情景中，那台黄色推土机不止是机器，还是权力的化身。拆除管委会办公室还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那不仅仅单是一座房子被拆除，还有一种正在崛起的民间权力被摧毁。官员们非常清楚，在浙江村的领导体系当中，金瓯处于象征性的核心地位。因此当众摧毁它就是政府权力的宣言，所有被认定为潜在的社会反抗力量都是其所针对的对象。此外，官员们预计只要拆掉中心，其他大院的人们自然会举手投降、老师搬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

在最初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中，我们都会很清晰地认识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或者西方语境下市民社会的论述。项飙的分析虽然大多集中于社会学或者经济的领域，但还是在他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浙江村的这个案例，是否还有制度和政治上的分析意义？他在回答中承认了自发性流动建立的行政边界，地域化的新社会空间对体制构成了挑战。这背后是国家对社会根深蒂固的疑虑，比如“以大院为独立的社会管理单位、和大院老板合作的尝试却得不到上级政府的认可”，政府担心大院老板因此获得更多的权力——任何提高社会自治的措施都可能降低犯罪率，但是在长期也可能引起国家于社会的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他认为，政府总喜欢靠“压”而非结构性调整来解决问题的真正问题⁹，还是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

这一角度虽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还是太单一了。正如葛兰西所谓“霸权”是要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没有对权力的承认也就没有权力，我们必须囊括被管理者，或者说社会的视角。比如，当项飙与北京大学的同学组建成的“爱心社”，想要帮助浙江村人的时候，他们却退缩了，当时的代表万佳友的表述是：

我本来也想去争取一下解决这件事情，但想来想去还是不好。你跟公安“斗”，怎么“斗”

⁹ 在读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的时候，我认为这一调整是可能的。北京市市长在风波中受到批评，或许和“国家”如此坚定的选择有关。

得过？你们说“对话”，我们是怕越对话公安越反感，到最后账还不是全算到我们头上！谁去就是谁倒楣。这里的人都只保自己头上干净，没人跟你一起担责任的。

项飙老师在当时的反思中也认为，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只靠“合同”而无“对弈”是不能达成真正的整合的。这似乎也在说明，虽然浙江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们”共同体，面对着一个“你们”时，还是缺乏凝聚力。

从信任的角度看，万的话似乎在暗示着一种人们之间的缺乏信任（人们都只保自己头上干净），但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似乎还要从文化上寻找。沙利文认为，信任的出现是由于幼儿时期对于“本体安全感”的需要，本质上有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性。卢曼认为信任中存在着某种超验的因素。我认为万的话语其实有一种对上层权力的“信任”，这个信任是混杂着对威权的恐惧和对权力话语的承认的。这或许是一种文化因素。如《信任论》此书写道：

社会成员间对相互习惯的依赖及对相互保持习惯的信任形成了社会关系和公共秩序的预期性。日常惯例造就了生活的稳定和预期性，并造就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定和信心，这种心理的感受帮助人们掩盖和克服本体中的不可预期性。

这种社会秩序是不会被轻易打破的，是存在某种“惯性”的。直到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宣传研究中，刘海龙研究的粉丝民族主义，认为新生代粉红是不会因“真相”而改变立场，混杂娱乐与政治的，把爱国主义当成情感实践的网民。在这背后，是对权威元话语的承认。

这一点或许项飙老师也有感受到，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有一篇的名字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提到当时认为浙江村在经济上发达，在地域上集中，在文化上相对同质，因此觉得它具有形成自我管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但在对爱心社的反思中，他认为：

我想的是如何培育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而工商户把爱心社看作他们“靠”上国家的一个渠道。他们看重北大，并不是因为它的特立独行，而是认为它和国家核心相联：我以为自主的公共空间非常重要，而他们认为国家的认可、正式身份的获得才能保证权益。

这样的复杂的社会与国家的纠缠，不仅是经济关系上的纠缠，更是文化上的纠缠。社会似乎不在国家之外，而成为国家的一个“工程”。国家成为一套治理能力，意欲全面渗入社会生活。“这些发展显然都不符合主流的理论设想，但是似乎都合乎民意；老百姓从来没有感觉国家过大过强是一个问题，也不觉得国家推进社会建设有什么不好。”

他从老百姓的日常表述中寻找答案：

我以为，当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总体化、自然化，很少人质疑其合法性和正义性；另一方面，

大家对具体国家机构的行为则高度怀疑，老百姓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利益化，甚至机会主义化。这两个层面上的冲突又反过来进一步使国家观念道德化。老百姓用道德化的语言来批判地方政府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机构的不满意激发他们对国家的道义期望。

这其实与政治信任的部分研究不谋而合。最后，读完张鹏老师的研究过后，大家都会思考：既然现实的实地空间不能够容纳，那么在线的“赛博空间”是否能成为国家-社会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一是政府权力对于网络治理的重视，单是从情感角度将所有引发共鸣的情感纳入“文明话语”的治理范畴（杨国斌的研究），就是在打压集体行动的温床。二是在现实生活中，当看到上海的“四月之声”是如此温和、不带激烈的情感，但仍被禁止时，我便清楚，治理术的目的是想要扼杀每个非“正规”框架下集体表达的可能。